

# “民警开警车回家”须过制度关

深圳副市长、公安局长刘庆生日前谈及警务工作时，提及一些社会观念需要扭转。他曾去西方发达国家调研，发现警察办公场地局促，原来警察是在警车里办公，警车的职责就是在路上开展工作维护治安。当地甚至还规定民警下班要开警车回家。他表示，目前深圳也向有关方面提出来，想尝试要求民警下班开警车回家。

(1月28日《南方都市报》)

## 甬上辣评

我国警察法规定，“人民警察在非工作时间，遇有其职责范围内的紧急情况，应当履行职责”。公安部也一再强调，要提高“见警率、管事率”。在这种背景下，允许甚至要求警察下班开警车回家，确实具有一定的合理性：一是可以提高社会的见警率，增强老百姓的安全感；二是提高警察的反应速度，能够保证第一时间赶往现场。

不过，警务的任何措施，都应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。比如，西方这些发达国家，允许乃至要求警察下班开车回家，并不是偶然的。不是因为办公场所局促，警察才在警车内办公，而是警察的职责与任务决定了他们应该工作在流动的街头，而不是清闲地待在办公室里。同理，要求警察下班开警车回家，也离不开防止警车私用的制度环境，离不开警察随时待命的纪律要求，在警察非休假期间，下班时段并非与执

勤彻底割裂。

学习借鉴外国的警务经验，好的形式固然可以照搬，但更重要的是学习他们务实先进的治警理念、突出效率的工作体系，以及廉洁高效的职业素养，来完善自身的警务建设。以警察下班将警车开回家为例，为何人家觉得非常正常，是职业的需要，而我们却容易莫名惊诧，自觉不自觉与公车私用挂上钩？这本身就值得思考。事实上，在公车管理宽松的年代，警车为私所用的现象时有发生。这样的现象当然只是少数，但是它真真切切地消耗了社会的信任。

任何措施都有弊有利，关键是如何保证为利所用而革弊防害。允许警察开警车回家，相信警车都用在警务上，给维护治安做加法，总是有所裨益。只不过，在当前的语境下，还得过一些关坎。这样的关坎并不是单单呼吁社会支持和理解，而该是完善警务用车制度，改革警务工作方式，真正让警察工作在街头，权力受到制约和监督。毕竟，真正取信于民的是制度而非态度。

木须虫

## ●议论风生



**@六合行者：** [日前浙江金华一家超市地下通道的墙上被刷上了红色的房子，同时安装了一排衣帽钩，上面挂满了衣物，还写着两行字：如果你需要，可以带走它。目前，已有多家公益组织送来衣物以示支持。] 希望这些衣服别被人拿到地摊上去卖。

**@2Jkwn：** [近日，牛津大学的心理学专家罗宾·邓巴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。他们通过调查 3375 名英国 Facebook 用户得出一个结论，即不论人们的朋友圈中有多少人，真正与自己互动的只有 4 个朋友左右。所以，社交网络对于交到更多真心朋友似乎不起什么作用。] 说到心里去了，然而不能发朋友圈。

**@ 用我的眼睛素描你：** [江苏南通一初中被曝寒假作业超多：除学校发的 30 张试卷，另外有 248 页试卷需要学生自己去校网站下载。这意味着每天至少要做 10 多张试卷。校长称，248 页并不是强制要求学生做的。] “小朋友，你寒假打算怎么过啊？” “写寒假作业。” “那剩下的呢？” “剩下的只有开学了再补做了！”

**@ 司令-silingo：** [1月26日，经群众举报，公安部 A 级通缉犯刘纪平在江西省瑞金市被警方抓获。此时房东杨某才知道他是 A 级通缉犯，悬赏金有 35 万元，杨某不禁怪自己平时不注意看新闻，错过拿奖金的机会。] 所以这篇新闻的意思就是：看新闻改变命运，是吗？



近日，一女子在北京广安门中医院斥责黄牛抢号的视频引发网上热议，女子称黄牛将 300 元挂号费炒到 4500 元，并存在保安与号贩子勾结的情况。广安门中医院回应称“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我们医院有号贩子”。28 日下午，记者获悉，警方在广安门中医院共抓获号贩子 7 名，其中 4 名作拘留处理。

(1月28日《新京报》)

**点评：**这脸啪啪打得响！现实点儿说，医院有号贩子不算什么稀罕事，但没有调查就这么忙着与号贩子切割，挺不把自己信誉当回事。

昨天，温州警方接到报警称，一名男子在他们办公室炒辣椒油，气味呛鼻。“炒油”男子姓叶，贵州人。他说这是在向老板讨要工程款，共计 56000 元。“本来答应先付 2 万元，其余的 4 月份再结清。”叶某说，他希望单位董事长能写一份保证书，但董事长拒绝，于是上演“催泪弹”讨钱的一幕。

(1月28日《浙江法制报》)

**点评：**每到年末，农民工讨薪的新闻就多了起来。只能希望公力救济更给力些，让农民工朋友对讨薪有更多信心，而不必想着法子私力救济。

在西安市莲湖区做环卫工的李贺(化名)遇到一件堵心事：前几天一家公司来献爱心，给每位环卫工发米面油。他领回去，却发现大米过期了。环卫工人道班房负责人承认有这回事，“是我们自己弄错了，和献爱心的公司没有一点关系”。环卫部门为什么会有这些过期的大米？这位负责人没有答复。

(1月28日《华商报》)

**点评：**办事出纰漏，谁也免不了，不过出了问题总要解释清楚。过期大米怎么来的？是采购来的，还是硬生生等着过年送温暖以至于过期了？如果是后者，爱心也就具有了“时令性”，让人挺不是滋味。



关注“志明有话讲”，请扫描二维码，或搜索添加同名公众号。

来稿请投邮箱  
wj1@cnnb.com.cn

## ●热点聚焦

# “猴哥”上春晚果真是民意反映？

著名表演艺术家六小龄童 26 日在微博上晒出了自己录制央视戏曲春晚时的“美猴王”扮相，“六小龄童节目被毙”的话题顿时引爆网络。网友自发为其打抱不平，开始呼唤六小龄童上春晚。六小龄童回应称，网传其与某明星合作表演上央视春晚被毙一事不实，但如果春晚需要他，他会义不容辞。

(1月28日《现代快报》)

从当下的舆论呼声来看，“六小龄童上春晚”已经成为一个话题，但作为一个围观者，我着实很纳闷，为何孙悟空的扮演者六小龄童一定要上猴年春晚呢？两者又有何必然关系？以前猪年春晚，也没见网友呼吁让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上春晚啊？蛇年春晚的时候，也没见网友呼吁让白娘子的扮演者赵雅芝上春晚啊？他们哪个不代表一代人的记忆？哪个的角色塑造不堪称为经典？

不过，从当下的舆论呈现来看，让“美猴王”六小龄童上春晚，的确呼声很大。这就不得不让人反思，这样的舆论到底是如何形成的，这是真实的民意反映吗？这还真需要静下心来好好捋一捋。

对于此次“六小龄童上春晚”的舆论发酵，我认为至少有两点需要厘清。首先需要强调的就是，必须要提防公关团队的炒作行为。假如这是公关团队人为制造出来的话题，那么此时的舆论呈现就是被裹挟进去的，是被动的。

回过头来看此次舆论的发酵，不难发现，前后不同媒体的报道是有出入的。比如最开始某媒体所谓的“独家报道”，

说的是“六小龄童与某明星合作表演上央视春晚被毙”，但后来央视春晚有关人士回应称“六小龄童从始至终就没有被邀请”。那么又何来“被毙”一说？所以，我们不能不提防有公关团队在制造话题，搭便车营销。如果真这样，在此语境下的呼声，能说是“民意反映”吗？

另外我想说的一点，就是网络民意的“群体极化”现象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在一个团体当中，一旦某些成员一开始有某些偏向，在商议后，这种倾向性会得到加强，使一种观点或态度从原来的群体平均水平，加强到具有支配性地位。在众声喧哗的互联网环境中，这种“群体极化”现象尤其突出。

关于“六小龄童上春晚”的呼声，其实刚开始很多人没有这个念头，就像没想过让赵雅芝、马德华上蛇年、猪年春晚一样。但在互联网这个大平台中，一旦一小部分人表达了这种呼声，缘于网络表达成本的廉价，很多人便会加入这样的队伍，想当然地认为缺了“美猴王”的春晚就是不行，而反对这种呼声，或者无所谓的人，则变成了“沉默的螺旋”。如此，网络空间便呈现出了一种所谓的“民意反映”。但这样的民意，未必是真实的。事实上，就算六小龄童最后上了春晚，这些呼吁的网友，真的都会打开电视看“猴哥”吗？

当然，网络舆论之繁复，非个人所能度量。但有一点还是要注意的，即网络表达未必等于真实民意，应该注意倾听，但又不能完全受其左右。

张松超

## ●社会观察

# 对职校生的偏见,应消失得再快一点

“不要与社会上不良青少年或职高学生混在一起，以防上当受骗或被欺负。”1月25日，浙江省海盐县行知中学德育处发送给学生家长的一条校讯短信，引发职高学生和职业学校的普遍不满，在网上引发热议。目前，该中学已在官方微博上道歉。

(1月28日《中国青年报》)

一句“不要与职高生混”，实在是夹带了满满的恶意。时至今日，环绕在职业教育周围的偏见与误解，还远未散去。虽然职教的重要性愈发凸显，然而全社会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，在一时之间总归难以扭转。于是乎，种种由来已久的隐忍情绪，在这场普高与职高之间的“短信风波”中，最终得到了集中释放。

一直以来，职校生并未获得充分的尊重与公允的对待。只不过，在大多数时候，所谓“歧视”往往是隐匿的、无形的，故而无从追究。不同的是，上述“提示短信”几乎是一种赤裸裸的歧视。因其中有图有真相，也就难免会贻人口实，成为众矢之的了。此事之所以引发职校学生的强烈反弹，概是由于他们终于找到一个明确的对象，来彻底宣泄内心都积压已久的不满。

“不要与职高生混”之说，当然毫无道理。其所涉及的，乃是对一个群体的普遍污名化，颇有以偏概全、人身攻击之嫌疑。从网友反馈来看，也呈一边倒之势，基本都是在声援

职校学生、抨击当事学校。这一局面说明，至少在公共舆论层面，对于职校生的歧视，已经失去了市场。可是需要追问的是，在现实生活场景内，人们对职校生的真实看法又是如何呢？

要知道，众人同声的公共发声，并不能代表个体的真实心声。就推动“公平看待职校生”而言，当事一方据理力争、主流舆论仗义力挺，无疑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。可是，倘若要彻底解开心结，显然还需要依靠更为有力的“事实说服”才是。这就要求，教育主管部门优化职教模式，从身份认同、价值激励层面，优化职校生的人格建构；与此同时，更要完善教学管理、拓宽就业机会，确保职教生有约束、有希望。

对于职教生的歧视，本质上来源于两个层面。一方面，是因为他们素来被视作“普通教育”的掉队者、淘汰者；另一方面，则是由于技术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上地位有限。在这一大背景下，无论是职校教育者，还是职校学生，都很可能变得消极乃至自我放弃。而这，反过来又强化了外界的负面评价……不过，一个确定的事实是，随着大环境的改变，职业教育本身以及其所培养的技术工人，前景都会大不一样。

所以，偏见终将消失，我们只是希望能更快一点。

蒋璟璁